

“飞夺泸定桥”是如何被世人熟知的?

“飞夺泸定桥”从命名到传播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1935年5月29日,长征中的红军惊险奇绝地夺取了泸定桥,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当时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科长的彭加伦以一篇题为《飞夺泸定桥》的短文记述了这段战事,收录在1937年2月于延安编成、1942年正式出版的《红军长征记》中。

1936年6月至10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进入陕北革命根据地采访,随后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曾专章深入地介绍了当时红军的情况以及长征。斯诺说,他在延安采访时曾见到《红军长征记》正在编的部分稿子,但他在该书述及大渡河畔战事时取题为“大渡河英雄”,“飞夺泸定桥”一名并未借斯诺的著作得到传播。

《红军长征记》因战争年代的条件限制,印数和影响都有限。1955年,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20周年,人民出版社以《红军长征记》为主体编辑出版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广大读者才知道了彭加伦以“飞夺泸定桥”命名记述的长征战事。值得注意的是,该书结尾附有“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概述”,在叙述中已经用了“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等后来习用的表述,但在述及夺取泸定桥时却说“强占了泸定桥天险”,可见“飞夺泸定桥”此时还没有成为惯用表述。1959年,刘伯承元帅在《八一杂志》第20期发表著名的《回顾长征》一文时谈及“我军攀援铁索冲过大渡河”,也未用“飞夺泸定桥”一词。

1964年9月,空政文工团以中国民族艺术团的对外名义出访蒙古、苏联、匈牙利、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缅甸六国,进行交流演出。演出节目中就包括经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审查通过的舞蹈《飞夺泸定桥》。由此,“飞夺泸定桥”的故事以艺术的方式在国际上得以传播。

“飞夺泸定桥”这一命名的进一步传播,得益于1965年8月6日杨成武在《解放军报》上发表的长篇回忆文章中沿用了“飞夺泸定桥”。杨成武长征时担任红四团政委,是夺桥战斗的现场指挥者,他向读者具体真切地讲述红军英勇夺桥战事。“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许多表现夺桥战斗的美术作品,大都命名为“飞夺泸定桥”,可见此时“飞夺泸定桥”这一命名已逐渐为人们所熟知。

1985年5月,中共甘孜州委、州政府、军分区在泸定隆重举行红军飞夺泸定桥五十周年纪念大会和飞夺泸定桥纪念碑奠基仪式,邓小平为纪念碑题写了“红军飞夺泸定桥”的碑名。聂荣臻撰写了碑文,高度肯定了“飞夺泸定桥”的历史意义。

此后,《红军长征史》、《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会史》等权威史书在叙述红军长征中夺取泸定桥的战事时均使用了“飞夺泸定桥”一词。可以看出,“飞夺泸定桥”与“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等表现长征战事的名称一样,已经成为红军长征史叙述的习惯表述。现今普遍使用的小学教科书中,选入了题为《飞夺泸定桥》的课文,更让以“飞夺泸定桥”为代表的红军精神得以广泛传播。

(据新华网)



红军飞夺泸定桥22名勇士已有8位姓名可以确认

独家披露:经最新查证,飞夺泸定桥的22名勇士中,目前有8位勇士的姓名可以确认:廖大珠、王海云、李友林、刘金山、刘梓华、赵长发、杨田铭、云贵川,其中有照片者4位:李友林、刘梓华、杨田铭、刘金山。

站在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公园门前,就会看到大道两旁的22根花岗岩石柱,分别代表着22位夺桥勇士。然而走近观看,却只能在5根石柱上找到勇士的姓名,其中只有2人根据照片在石柱顶端雕出了头像。其他勇士呢?是谁?在哪里?什么模样?有什么样的生平事迹?

泸定县原人大主任、今年72岁的王永模,每天都在苦苦寻找着这些问题的答案。就在5月23日,他又收获了新的惊喜。

记者:王老,听说您1999年退休以来,一直在为寻找22位夺桥勇士的英名和事迹而奔忙?

王永模:是啊。红军22勇士飞夺泸定桥,创造了无与伦比的英雄伟绩和人间奇迹。聂荣臻元帅在为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撰写碑文时,用“奇绝惊险”4个字发出了由衷地赞叹。弹指一挥间,70多年过去,他们中大多数人却连名字都不为世人所知,真让人遗憾!无论从告慰勇士在天英灵的角度,还是从弘扬长征精神的角度,我都有责任为寻找他们的英名和事迹

去操心、去奔波。

记者:现在,您找到了哪几位勇士的下落?

王永模:纪念馆建馆时,有关部门已找寻到5位勇士的姓名,他们是廖大珠、王海云、李友林、刘金山和刘梓华,并搜集到李友林、刘梓华两位勇士生前照片和部分生平史料。后来,在我们的努力下,国内许多媒体和红色网站都热情参与了寻找勇士的行动。到2007年,在上海、南昌新发现了两名勇士——特等机枪手赵长发、战士杨田铭。

记者:具体是怎样发现并核实的?

王永模:最初是杨田铭的大女儿杨党燕,在上海看到红色网站的寻呼后,打来电话说:“我父亲杨田铭是飞夺泸定桥22勇士中活下来的18勇士之一。”我立即委托东方电视台的记者去登门访问杨党燕,后来又联系上杨党燕的妹妹杨继红,最后终于在江西省图书馆找到了有关杨田铭的资料,还有他1961年5月21日发表在《江西日报》上的回忆文章《飞夺泸定桥》及保存在家中的照片。根据杨田铭在回忆录中的描述,我们又确认了另一位勇士赵长发的英名。

记者:您还找到一位叫“云贵川”的勇士?

王永模:那是1985年1月,我去北京,邀请曾任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政委的杨

成武将军来泸定故地重游,参加红军飞夺泸定桥50周年庆典。我告诉他,我们苦苦寻找22勇士多年了,希望他回想一下有没有印象深、记得住的勇士。他说:“有一个在贵州入伍的苗族小战士,只有十六七岁,中等身材,眉棱、颧骨很高,脸带褐色,眼大而神。家里很贫穷,从小跟着父亲在深山密林中采药、打柴,攀崖涉水很内行。因为他人入伍时没有名字,战友们就给他起了个名字叫‘云贵川’。在夺桥战斗中,他攀援铁索,和廖大珠一起冲锋在前,后来,打腊子口他还立了一功。”就这样,我找到了第8位勇士的名字——云贵川。

记者:听说您最近又有新收获?

王永模:是的,就在5月23日,我收到烈士后代寄来的刘金山勇士的照片和生平史料。真是苍天有眼,英雄魂系泸定。今后在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公园,又可以新添一位勇士的头像供人瞻仰了。

记者:您这么大年纪了,每天为找寻勇士的英名而奔忙,很辛苦吧?

王永模:70多年过去,要找到普通战士这一层面的英雄人物,确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这是历史和社会赋予的重托,是发扬光大红军精神的现实需要,是泸定人民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我会坚持不懈,在有生之年一直找下去!

(据新华网)

邓小平披露红军“真正优势”

长征初期,由于党内的“左”倾错误领导,根据地丧失殆尽,中国革命遭受了严重挫折。长征开始后,主持中央工作的博古和领导红军的李德在战略退却中奉行逃跑主义,又造成湘江战役的失败,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为3万余人。面对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红军没有什么可以依靠,他们在遵义会议确立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凭着对

党的赤胆忠心,凭着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心,迅速从初期失利的阴影中摆脱,扫清北上抗日道路上的一切障碍,最终走向胜利。

面对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红军浴血突围,昼夜兼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智取娄山关,突破腊子口,用双脚在绵亘数万里的土地上与敌人的飞机汽车进行竞赛,

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在两年多时间里与强大国民党军队展开一场殊死搏斗;敌人重兵始终打不倒、压不垮他们。面对残酷自然环境的考验和极端匮乏的物质生活条件,红军上下团结一心,同甘共苦,生死与共,爬雪山、过草地,尝百草、嚼草根,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终于从“死亡地带”走了出来。

在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

国焘拥兵自重,反对中央北上方针,提出南下的错误方针,公然与党中央对抗,分裂党和红军。在这种危急情况下,红军官兵从大局出发,从革命的根本利益出发,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坚定的信念使广大红军战士头脑清醒,立场坚定,能够自觉抵制狭隘的个人主义和小团体主义。在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面前,坚定的信念使

红军凝结成一个坚不可摧的集体,最终实现三大红军主力的胜利会师,开创了革命的新局面。

邓小平指出:“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

(据新华网)